

正统与华夷：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刘浦江◎著

ZHENG TONG YU HUA YI
ZHONG GUO CHUAN TONG ZHENG ZHI WEN HUA YAN 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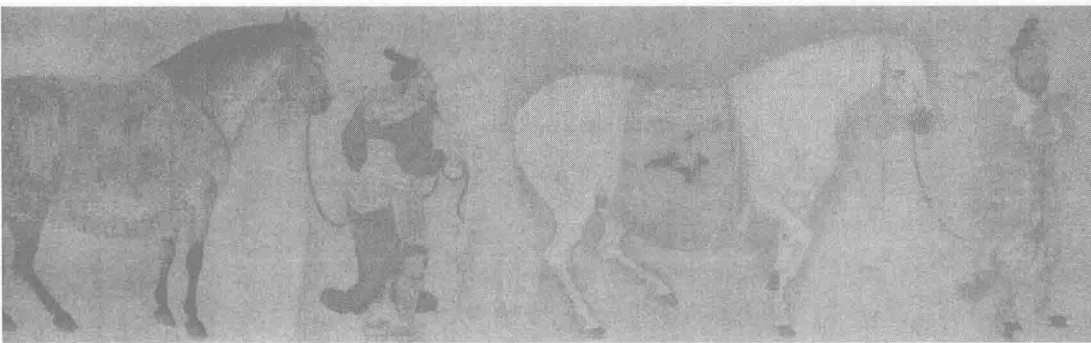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正统与华夷：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刘浦江◎著

ZHENG TONG YU HUA YI
ZHONG GUO CHUAN TONG ZHENG ZHI WEN HUA YAN 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刘浦江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9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12579-5

I.正… II.刘… III.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IV.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0569号

-
- | | |
|-------|---|
| 书 名 |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
| 著 者 | 刘浦江 |
| 丛 书 名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
| 责任编辑 | 胡 珂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0¼ 插页2 字数293千字 |
| 印 数 | 1-25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579-5 |
| 定 价 | 79.00元 |
-



刘浦江 (1961—2015)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辽金史、民族史学家。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1988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著有《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编著《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合编，中华书局，2014年）两部工具书，主持完成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中华书局，2016年）。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0 年 5 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第十三种)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 | | |
|--------------------------|----------------|
| 朗润学史丛稿 | 邓小南 著 |
|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 陈苏镇 著 |
|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 |
|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 | 王小甫 著 |
| 旧史舆地文录 | 辛德勇 著 |
| 田馥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 |
|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 | 刘浦江 主编 |
| 石室贻言 | 辛德勇 著 |
| 祭獭食醢 | 辛德勇 著 |
| 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 | 叶纯芳 乔秀岩 |
|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 | 罗新 叶炜 |
| 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 | 孟宪实 著 |
|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 刘浦江 著 |
| 宋辽金史论集 | 刘浦江 著 |

责任编辑 / 胡珂
封面设计 / 周玉

目 录

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1
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	35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61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88
历史是怎样写成的?	
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	116
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	143
“倒错”的夷夏观?	
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	172
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	
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	204
附 录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	
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	239

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	269
四库提要源流管窥	
以陈思《小字录》为例	298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编后记	315

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 正统论

正统问题是困扰中国人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历来深受史家关注。秦汉以后,五德终始说成为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顾颉刚先生的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一次全面揭示了五运说给秦汉政治史带来的深刻影响。^①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以及异族的人主中原,对旧有的华夷秩序和正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近年何德章、川本芳昭、罗新等人围绕着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德运之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②宋代的儒学复兴使延续千余年的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宣告终结,^③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正统之辨成为士大夫最热衷的话题。对于宋代以降的正统观念,陈芳明、陈学霖、刘复生以

①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617页。

②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正統」王朝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25号,1997年1月;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参见本书所收“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第61—87页。

及笔者从各个方面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①但迄今为止,有关隋唐时代正统论下的历史观念,似乎尚未进入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说到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自然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当来自于北朝,然而这种主张在当时和后世都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为了解决南北正闰之争的分歧,士大夫们曾提出多种正统体系,成为重新检讨北朝正统论的思想资源,有的设想甚至被付诸政治实践。直至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起来以后,传统的北朝正统论才被彻底颠覆。但在此后有关正统问题的讨论中,南北朝正闰之辨依然是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及的话题,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思想史的分析样本。

一、北朝正统论之成立

隋唐帝国的出现,结束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②如何裁判南北朝的正闰纷争,如何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隋唐政治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隋唐时代主流的正统论可称为“北朝正统论”,这是由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隋朝建国之初,就明确了继承北朝法统的政治立场。杨坚禅代之际,与崔仲方、高颀等人“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后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③开皇元年(581)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

① 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食货月刊》复刊1卷8期,1971年11月。Hok-lam Chan(陈学霖),*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氏著《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本书所收《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第88页;《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第35页。

②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6册,第1706页。

③ 《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第5册,第1448页。

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① 杨氏代周而立，政权来路不正，很容易让人质疑它的合法性，为了膺服人心，杨坚称帝后竭力树立隋朝正统。《隋书·礼仪志》曰：“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开皇间，王劼屡屡上书言符命，缕述隋室火德承周木德之瑞应，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讖纬，依约符命，拊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② 两《唐书》著录有许善心《皇隋瑞文》十四卷，大约也是类似的应时之作。又据《隋书·许善心传》说，炀帝“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璿撰《灵异记》十卷”。总之，隋朝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是将隋王朝的正统性建立在继承北朝法统的基础之上的。

李唐王朝代隋而兴，按照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应是以土承火。关于唐初德运的确立，两《唐书》缺载，仅见于《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③ 两天之后，高祖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

上天回眷，授历朕躬，隋氏顺时，逊其宝位。敬承休命，敢不对扬，永作我宾，宜开土宇。其以莒之鄆邑，奉隋帝为鄆公，行隋正朔，车旗服色，一依旧章，仍立周后介国公，共为二王后。^④

新王朝建立后，奉前朝后裔为二王、三恪以示尊崇，是周代以来的古典。惟二王、三恪之本义，向有不同解释，一说“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后为三恪”，

①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第1册，第15页。

② 《隋书》卷六九《王劼传》，第6册，第1608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91页。《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详述历朝德运，唯独不见唐朝德运之经纬，仅有一小注云：“臣（王）钦若等言：唐初事阙。”（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刻本，1960年，第46页上栏）可见宋初修《册府元龟》时已经看不到有关唐初确定德运的记载，《通鉴》当另有所据。

④ 《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91年，上册，第539页。高祖于武德元年五月二十日称帝，此诏发布于五月二十二日。

一说“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为三恪”,隋唐以后皆取后一说。^①高祖奉周、隋子孙为二王后,是唐王朝正式承认北朝法统的标志。玄宗时,又增封北魏后裔,连同先前所封周、隋二王后,是为三恪。天宝七载(748)五月十三日制曰:

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周备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汉从损益,惟立二王之后。自兹以降,且复因循,将广继绝之恩,式弘复古之道。宜于后魏子孙中择拣灼然相承者一人,封为韩公,准鄘、介公例,立为三恪。^②

次年七月,“封后魏孝文十代孙元伯明为韩国公,以备三恪”。^③据《周书·武帝纪》,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始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以绍魏后”。隋氏代周后,其子孙袭封如故。唐朝前期,仅封二王之后,未备三恪之礼,故元氏子孙不再继续袭封韩国公之号。玄宗诏封元魏后人为韩国公,系袭周隋旧制,元伯明即元谦六世孙。^④此事的政治文化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唐朝将其所继承的北朝法统上溯到了北魏。

唐王朝坚持北朝正统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令狐德棻曾经对高祖说过一番很坦诚的话:“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指高祖祖、父李虎和李昞)功业,并在周时……”^⑤这便是北朝正统论的原始动机。对于出自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来说,继承周隋法统是不可动摇的政治立场,是一个

① 《通典》卷七四礼典三四宾礼一“三恪二王后”,王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册,第2029页。秦惠田《五礼通考》卷二二五宾礼六“三恪二王后”条(清乾隆秦氏味经窝刻本,叶1a)辨析甚为详确:“(三恪二王)后之说者各不同,有以二王之前复立三恪,并三与二为五代者,郑康成、刘熹、崔灵恩之说也;有以二王之前止立一代,二王即在三恪之内者,杜预、魏收、杜佑之说也。汉魏以前多主郑说,唐宋以后多主杜解。”按三恪之“恪”,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页)据《周窻鼎》认为“窻(恪)”乃“客”之异文,三恪即三客,谓以客礼优待前朝子孙也。

② 《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上册,第540页。

③ 《通典》卷七四礼典三四宾礼一“三恪二王后”,第2册,第2029页。

④ 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册,第3401页。

⑤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8册,第2597页。

必然的历史选择。

作为唐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北朝正统论,在李延寿的《南》、《北》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何德章先生将李延寿尊北抑南的《春秋》笔法归纳为三条:第一,南朝、东魏、北齐帝纪必系北魏(西魏)、周、隋年号;第二,北魏(西魏)、北周皇帝卒,《南史》书为“崩”,而南朝、东魏、北齐皇帝卒,《北史》书为“殂”;第三,北魏(西魏)、周、隋对南朝、东魏、北齐用兵称为“讨”、为“伐”,反之则为“侵”、为“略”。^①很明显,在《南》、《北》史的义例和书法中,贯穿着以北魏(西魏)、周、隋为主角的北朝正统论。王鸣盛认为,李延寿之尊北抑南,乃因其“先人世为北臣,故其言如此”。^②钱大昕对这种解释颇不以为然:

唐高祖受禅于隋,隋又受于周,周又受于魏。且唐之先世仕于西魏及周,居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但各为一书,读者犹或未喻,延寿并而为一,则词意轩轩判然矣。若云以世为北臣之故,则延寿之曾大父晓、大父仲举皆仕于齐,故国之思,当在邺都,……而纪中书法仍右周而左齐。盖延寿为唐臣,故以唐所承为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③

钱大昕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南》、《北》史尊北抑南的书法,并非仅代表作者李延寿的个人立场,而是唐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

如果说北朝正统论在唐初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后来它则逐渐衍生为一种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对隋唐直至北宋前期的历史著作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皇甫湜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讨论东晋、北魏正闰问题时,曾谈到唐人史书的倾向性:“往之著书者有帝元(指元魏),今之为录者皆闰

① 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统观》,《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② 见《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北为正”条,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上海文瑞楼本,1987年,上册,叶5a。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答问九》“诸史”,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这段话是由下述问题引起的:“李延寿《南》、《北》史,本纪多尊北而轻南。……说者谓延寿先世为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此处虽未明指“说者”之名氏,但显然是针对王鸣盛而发。

晋。”^①皇甫湜是中晚唐人,根据他的说法,坚持北朝正统是唐人史书在处理南北朝关系时所采取的普遍原则。甚至连释氏史书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性,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就对南北朝的正闰纷争表明了他的态度:

世袭乱离,魏晋更霸,各陈正朔,互指伪朝。……仍自诸代国史,昌言我是彼非,斯则一是一非,一政一虐,都难惬意,谁敢筹之?故北魏以江表为岛夷,南晋以河内为獯鬻。周承魏运,魏接晋基,余则偏王,无所依据。而宋、齐、梁、陈之日,自有司存,国亡帝落,遂即从诸笔削,可不然乎?^②

饶宗颐先生试图从道宣的家世去解释他主张北朝正统的倾向,因谓“道宣父于陈为显宦,彼以南人仕北,或有所忌讳”云云。^③这一看法恐怕还值得斟酌。据《大唐内典录》卷首题记,此书撰于高宗麟德元年(664),时过境迁之后,此时南北正闰之辨已经不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生为唐人的道宣似乎不应该存有什么忌讳。我觉得,与其将道宣的倾向理解为个人特定的政治立场,毋宁把它看作是受唐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大众化的历史观念。

隋唐时代的北朝正统论,除了轩轾南、北一层意思,还有一个东、西统系的取舍问题。自北朝分立,周齐相争,双方都以元魏的继承者自居。魏周禅代之际,百官上奏曰:“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惟文王(按宇文觉追尊其父为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乌。”^④而先于北周建国的北齐,也同样自称以木德承魏水德。^⑤成书于北齐时代的魏收《魏书》,

①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唐文粹》卷三四,《四部丛刊》本,叶13b。

② 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后周宇文氏传译佛经录”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目录部,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271页。

③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④ 《周书》卷三《孝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第1册,第46页。《隋书·崔仲方传》(第1448页)也说“周为木(德)”,而《通典》卷五五礼典一五“历代所尚”(第1546页)云:“后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讖故也。”这显然是误解了《周书》的意思。

⑤ 北齐之德运,唯见于《通典》卷五五礼典一五“历代所尚”条(第1546页):“北齐木德,正朔服色,皆如后魏。”

自然取尊东抑西的立场。王鸣盛指出：“《魏书》直以东魏孝静帝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为立纪，仅附见《孝静纪》中，……无非助齐抑周之意。”^①及至齐灭于周，周隋禅代，北魏、西魏、北周一系的法统得以确立，魏收《魏书》的政治立场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开皇间，文帝“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②“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③魏澹《魏书》可以说是专为树立西魏正统而撰述的一部史学著作，此书虽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考证，知今本《魏书·太宗纪》亡佚，系后人以魏澹书补入，故其义例书法与魏收之书迥然有别，余嘉锡先生论之已详。^④

李延寿修《北史》，虽多取资于魏收《魏书》，但在涉及正统问题时，采取的立场却是与魏澹非常接近的。《北史·序传》载其上《南》、《北》史表，称《北史》“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云云。所谓“三代”者，即北魏（西魏）、周、隋，这是《北史》的主线，而东魏、北齐则只是被作者视为“三代”之附庸而已。关于《南》、《北》史尊西抑东的书法，上文所引何德章文已有详细论证，兹不赘述。

成书于中宗景龙三年（709）的元行冲《魏典》，是惟一部编年体的元魏国史，“起道武帝，终宇文革命”。至于东、西分立，它所采取的体例是：“孝武入关，则书东魏为东帝，并载两国事。”^⑤虽云“并载两国事”，但西魏不称“西帝”，却称东魏为“东帝”，显然是以西魏纪年，采取以西魏为主的立场。

不过，论及北朝正统论所涉及的东、西统系取舍问题，还应该注意到唐

① 《十七史商榷》卷六六“以西魏为正统”条，下册，叶7b-8a。

②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第5册，第1417页。

③ 《史通·古今正史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1页。刘知幾批评魏澹《魏书》“以非易非”（见《外篇·杂说下》，第377页），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南朝正统的缘故。

④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册，第157—178页。

⑤ 《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二“《魏典》”条引《崇文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2001年，第5659页。

宋文献中存在的三条“反证”。其一，《艺文类聚》帝王部在东晋之后续以宋、齐、梁、陈诸帝，梁、陈之间插入北齐文宣帝，却并不取北魏、周、隋。^①这应当作何解释呢？《艺文类聚》编纂于武德五年至七年，奉诏参与编修的有给事中欧阳询、秘书丞令狐德棻等人。作为一部唐初官修类书，且又是这样一些身份显赫的作者，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尊南抑北、尊东抑西的立场。^②若谓因袭北齐之《修文殿御览》，则不当取南朝而去北魏（东魏）。看来其中当另有缘故。四库提要曾对《艺文类聚》的门类提出批评：“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渎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③如此说来，《艺文类聚》帝王部之取南朝、北齐而舍北魏、周、隋，无非是编纂过于粗率而已，并没有什么深意，与作者的正统立场其实是毫不相干的。

另外一条似乎与唐人正统观念相矛盾的史料也值得认真分析，这条史料见于《魏书》。《魏书·天象志》共计四卷，其中第三、四两卷早在宋初即已亡佚，今本系后人补入。百衲本《魏书》在《天象志三》的卷末附有宋人刘攽、刘恕等人的校语，谈到了这两卷文字的来历：

魏收书《天象志》第一卷载天及日变，第二卷载月变，第三、第四卷应载星变。今此二卷，天、日、月、星变编年总系魏及南朝祸咎。盖魏收《志》第三、第四卷亡，后人取他人所撰《志》补足之。魏澹书世已无本，据目录作西魏帝纪，而元善见、司马昌明、刘裕、萧道成皆入列传。此《志》主东魏，而晋、宋、齐、梁君皆称帝号，亦非魏澹书明矣。《唐书·经

① 见《艺文类聚》卷一三帝王部三、卷一四帝王部四，汪绍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1—259页。至于其他隋唐时期的类书，《北堂书钞》帝王部没有系统地记载帝王世系，《初学记》帝王部至晋而止，所以都不涉及东、西统系取舍问题。

② 据两《唐书》本传，欧阳询为潭州人，其父仕陈为广州刺史，但以谋反被诛；令狐德棻先居敦煌，后迁关中，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政治倾向与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理应是一致的。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艺文类聚》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页下栏—1142页上栏。